我们六九届

文/戴存亮

蓦然回首

老三届，特指上世纪六六、六七、六八届初、高中毕业生。我们六九届，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那时共和国刚刚建立不久，百废待兴，欣欣向荣。我们不知道大人们在忙些什么，童年生活无忧无虑，周围看到和听到的都是阳光、鲜花、歌声、笑声。那时候，我们最喜欢说得一句话是“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”，对未来，我们充满憧憬与期待。

1966年夏天，六九届小学毕业，面临跨进中学大门。一场史无前列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。顿时间，六九届处于迷茫、彷徨、困惑、不安之中。

六九届与老三届虽然同是“六”字头届别，但彼此间如同隔了一道鸿沟，难以跨越。无论是社会知名度，还是在各种媒体上的存在感，老三届都远胜一筹，六九届似乎是消声匿迹，难见踪影。究其原因，老三届都在“文革”前的正规中学历练过，人生阅历也比较丰富，即使是比六九届大一届的六八届，短短一年的中学生涯也足以成为他们炫耀的资本。就连参加“红卫兵”，也没有六九届的份。后来，选拔“工农兵大学生”，“老三届”占尽优势，六九届则凤毛鳞角。拨乱反正后，“老三届”脱颖而出，在各条战线担当重任者众多，而六九届就显得先天不足，拔尖者甚少。

出于尴尬状况下的六九届，注定命运不济，前途坎坷。三年中学生涯，进厂学工，下乡学农占去了大半年时间，名义上的中学生，其实只有小学文化水平。等到毕业分配，以前“四个面向”（面向边疆、面向农村、面向工矿、面向基层）的分配原则已经取消，整个六九届被“一片红”，统统上山下乡“绣”地球去了（之前的六八届初、高中毕业生也未能幸免）。这一去，长夜漫漫，路途迢迢，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周岁。

终于熬到可以回城，六九届随着返城大潮回到城里，原以为苦尽甘来，谁知道等待他们的是种种的无奈和无助。回城后的六九届，还未能休养生息，让疲惫的身躯歇一歇，喘口气，便赶上整个社会告别“读书无用论”，万众一心追逐“文凭”。为了安身立命，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，几乎所有六九届都投身于“青工补课”，为了一张“文凭”，六九届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心血。许多人从初中一直读到本科，在并不年轻的时候再次走进课堂，拿起书本，其心其志的磨难可想而知。

恢复高考，成为一代青年改变命运，脱颖而出的一次绝佳机会。在千军万马挤向“独木桥”的过程中，六九届无疑输在了起跑线上。在那些金榜题名者中，除了应届毕业生，“老三届”得天时地利人和，占了大半壁江山，而六九届则是屈指可数。招工，“老三届”由于社会阅历、文化实力更具优势，得到机关、学校、银行以及国营大中企业青睐，而六九届许多人无奈于种种“先天不足”，只能“屈尊”于街道工厂、里弄生产组之类的集体企业。

改革向纵深发展，“下岗”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一道“沟坎”。众多的六九届由于处于生产第一线，无职无权，即使身怀绝技，本领高强，亦只能随着企业关、停、并、转而下岗回家。面对上有老，下有小的家庭重担，下岗后的六九届千方百计寻求再就业。在保安、营业员、交通协管员队伍中都可以看到六九届的身影。

如今，六九届都已过了退休年龄，大都有了第三代。一生清贫，终日辛劳，也该颐养天年，过好晚年生活了。广场舞的队伍中，可以看到六九届娴熟的舞步；老年大学的教室里，可以看到六九届刚劲有力的书法作品；农家乐的小院里，可以听到六九届爽朗的笑声；飞往世界各地的航班上，可以看到六九届结伴出行的身影。

六九届把青春献给了国家，把责任担当在肩上。历经坎坷，蹉跎岁月，倔强、打拼始终是不变的信念。六九届生不逢时，命运不济，如今，赶上了好时代。

人生驿站

知青水电站

1971年秋，70届初中毕业的我们，从黄浦江畔来到了大别山脚下——安徽省霍邱县红旗大队插队落户。

红旗大队位于全国著名的淠史杭灌区内。俗话说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红旗大队虽然靠着淠河渠，可乡亲们却从未用上过电灯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放眼起伏的冈峦，除了偶见几个萤火虫寂寂地飞舞，天地间仿佛被浓墨倾盖了一般，我们课本中学过的“伸手不见五指”，此时才得到了最形象的诠释。因此，知青们享用电灯的欲望特别强烈。

上海知青陆宝根提出，利用淠河渠可建个小水电站。陆是知青中小有名气的“三脚猫”，但问题是发电机、电线、电杆哪里来？上世纪70年代初，安徽农村十分贫穷，乡亲们点灯的煤油还是用鸡蛋换来的，集体积累也几乎为零，哪去筹钱呢？七嘴八舌中有人突发灵感：伸手要！是啊！知青们一下开了窍，红旗大队是“知青先进单位”，领导经常来视察，我们可“伸手要”啊！

一天上午，地委书记来红旗大队了，知青们迅速从田间地头赶来，“原汁原味”的、或赤着脚、或穿着草鞋、或戴着草帽，围着书记汇报在农村“战天斗地”的体会。上海女知青鲍雪清悲情地说，我们想多学点文化，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，可是天天在煤油灯下看书，把眼睛都熬坏了。我们想建水电站，就是没钱买发电机。看着跟农民一样晒得黝黑的知青，书记动情地说：我们关心不够啊！然后跟同来的秘书说：记着，一定要给知青解决发电机！

知青们欢天喜地地送走了地委书记，一个月后，又欢天喜地地从梅山水库接来了地委无偿调拨的发电机。首战告捷！知青们信心满满地又制定了向县委书记“伸手要”电线、电杆的方案。经测算我们决定分步实施，先把大队部和小学校的电灯拉上。拿着县委书记的批条，我们终于筹齐了水电站和一期通电的材料。大队又送陆宝根到上海机电学院培训了三个月，陆由“三脚猫”成了红旗大队的正式电工了。

水电站的建设和电线路敷设十分顺利。通电的当晚，陆宝根像个指挥官，见水电站顺利发电的指示灯亮起，就示意大队支书合闸亮灯。但没料到，闸合上后灯却未亮。经过紧张的排查，最终发现一捆未舍得剪断的应是20米长的电线圈，县供电局竟吝啬地用两根不足10米的电线敷衍我们。陆把两根线接通后，电灯一下子亮了起来，欢呼声瞬间冲响了天空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知青们相约重游红旗大队，红旗大队已旧貌换新颜。公路两旁白杆绿罩的路灯傲然挺立。村里办起了制面厂，乡亲们用上了彩电、冰箱，我们去探望了一位五保户，老人的桌上也赫然摆放着黑白电视机和电饭煲。我们乘坐的汽车在淠河渠大坝上行驶，但见早已废弃的水电站房依然默默地矗立着，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往日的艰辛和荣耀。知青们感慨万千：过去的一切，只有在无尽的追忆中依稀相见，我们愿珍存美好的记忆，心中永恒一片光明。 李竹勇

知青在田间劳作（资料图片）

青葱岁月

在西双版纳农村插队

1969年3月，我们从上海来到西双版纳勐遮曼拉高生产队插队。安顿下来，却发现寨子里竟然没有厕所！这是我们初到曼拉高一个惊人的发现。

男知青可以“打游击”，最最苦的要数女生。虽然，女生们有备而来，每人都带了痰盂缸，但没有地方处理呀。好不容易找一个偏僻角落处理掉，女生们红着脸，提着痰盂去井边洗刷。这下子可不得了，男女老少怒目而视，叽里呱啦地不知说些啥。复员军人岩宾来翻译了。原来，寨子里的井水是只供饮用的，绝不允许屎盆尿桶靠近。

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：这吃喝拉撒，人之本能也，难道傣家人只进不出？难道种田也不用肥料？

岩宾告诉我们，傣族种田确实不用人粪，最多用牛粪、马粪。西双版纳有的是地。因为地多，一般一年只种一次，今年种这块地，明年种那块地，刀耕火种，也不求高产量。

那么傣家人究竟去哪里方便？第二天我们跟就“踪”追“迹”，终于真相大白：原来在河边！说河，其实是不太深的溪水，男人在一头，女人在一头，互不干扰。屁股泡在水里，既不臭又免冲洗。农村少纸，一根篾片随手一刮就丢掉。

这样的风俗，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上海学生实在不敢仿效。几经协商，队长终于同意在生产队的菜园里盖一个茅房，这才解了女生们的燃眉之急。后来我们有了新的发现：寨子里放养的猪都吃屎！于是我们常在夜色掩护下到竹楼的阳台上“掼炸弹”，猪们闻讯赶来打扫战场，不留一点“炸弹”的痕迹。

随着知青的到来，生产队开展了学大寨运动，提倡科学种地，建起了一个阔气的公厕，雪白的墙，青青的瓦，队长下令：进公厕办公一次，加1个工分，还派人值守。因为新鲜，第一个月门庭若市，以后渐渐稀少，最后门可罗雀，不得已而关闭。

一个民族的习俗毕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啊。 卞林夫

往事难忘

革命化儿歌

那时我在山村海源的一个村办小学当赤脚教师。一天晚上正在备课，忽然听得楼下传来一阵欢快的儿歌声。儿歌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唱道：“红花红花几时开？”“红花红花一月开。”“红花红花几时开？”“红花红花二月开。”从一月一直唱到十二月。探头朝下看，窗下一群小女生正唱着儿歌在跳橡皮筋。我顿时警觉起来：小姑娘们从小就爱花花草草，势必会销蚀革命斗志，长大了怎么能接革命事业的班呢？我立刻下了个决心，那夜我忙了大半宿，终于赶写出一组革命化的儿歌。

第二天我在课堂上严肃地讲了一番革命道理，然后吩咐她们把新儿歌抄写在练习本上，规定以后跳橡皮筋时一定要唱革命化的儿歌。当天晚上，“拿起笔，作刀枪，批林批孔当闯将……”铿锵而富有节奏感的儿歌声飘进窗来。我很有一点成就感。

后来放暑假，我到中心小学开会，几天后才回村子。插兄们告诉我：“你外出的这几天晚上，她们仍旧大唱‘红花红花几时开’，没当过一回‘闯将’。”啊，原来她们是在敷衍我。我心里不免有点失落，却也没有再强求。

许多年后我才明白，小娃娃怎会喜爱政治性极浓的、生硬的说教呢？幸好，我终究没有扼杀她们课余的童趣。

赵全国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